·历史研究·

DOI:10.20004/j.cnki.ujn.2026.02.006

兵变与党争:以吴桥兵变为中心

肖清和

[摘　要]发生于崇祯四年(1631)闰十一月的吴桥兵变对晚明局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吴桥兵变发生后,朝野形成了主抚与主剿两派。两派势同水火,严重影响了对叛军的决策部署,从而也决定了两派在兵变结束后的不同结局。因主剿派对主抚派的反攻倒算,使得主抚派在兵变结束后被彻底清算,温体仁借此攻击周延儒势力,并如愿成为首辅。党争一方面使得应对兵变的决策部署变得更加复杂,从而延误战机;另一方面兵变结束后的清算又进一步加剧了党争。吴桥兵变还使得"主抚"变成"政治不正确",使得亲西学派在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,对明清易代以及清初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[关键词]吴桥兵变;党争;亲西学派;反西学派

由于缺饷、腐败等因素,晚明时期边疆各地时常发生兵变。从万历到崇祯时期,正规军与降民兵变增多,朝廷对于兵变的政策则以招抚为主,但对于兵变首恶以及主要负责官员则予以严惩。晚明兵变往往成为政敌攻击对手的借口,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党争[①]。本文以吴桥兵变为例,梳理兵变过程中的党争因素,并分析由此对晚明局势的深刻影响。吴桥兵变是影响晚明局势的一个重要事件,围绕该兵变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其发生的原因、过程与影响[②],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党争因素有所忽视。实际上,通过分析可以发现,吴桥兵变中的主抚与主剿两派势同水火,是导致局势进一步激化的主要因素,而主抚派主要是亲西学派,主剿派则是反西学派。本文主要根据徐从治的《围城日录》、毛霦的《平叛记》等资料,在梳理吴桥兵变过程的基础上,着重讨论其中所涉及的党争因素。

一、吴桥兵变过程

有关吴桥兵变(又称登州之变、孔乱、莱州被围等[③]),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《崇祯实录》《崇祯长编》

[基金项目]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"文明互鉴视阈下的明清基督教核心概念与思想研究"(项目编号:23BZJ053);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(项目编号:2024)。

[作者简介]肖清和,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邮箱:xiaoqh@pku.edu.cn。

①李贤强:《明代北部边疆兵变的发生与处置》,《湖北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1年第4期。

②关于吴桥兵变的专门研究成果比较少,目前所搜集到的有:黄一农:《吴桥兵变: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》,(台湾)《清华学报》,2012年第1期;黄一农:《崇祯朝"吴桥兵变"重要文献析探》,《汉学研究》,2004年第2期;孙卫国:《登莱事变及其对明、后金与朝鲜的影响》,陈尚胜主编:《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5年版;宋伯胤:《孙元化与吴桥兵变》,《天津益世报·人文周刊》,1947年12月15日第32期。

③吴桥兵变包括四个阶段:吴桥哗变、登州陷落、莱州被围、孔有德降清。因此,所谓"登州之变"等均指吴桥兵变的某个阶段。

《国榷》《通鉴辑览》等文献均有记载。《明史·本纪》记载较为简略[①]。《明史》徐从治、孙元化、王道纯、张可大等传中亦载有吴桥兵变的相关内容。吴桥兵变的亲历者徐从治的《围城日录》、莱州本地人毛霦的《平叛记》记载得较为详细。

《明史》载孔有德率师援辽,次吴桥反。据《平叛记》,吴桥兵变的起谋者当为李应元、李九成父子,而共谋者有孔有德、耿仲明、陈光福等人。吴桥兵变的导火索是一只鸡。

崇祯四年(1631)闰十一月二十七日,登州援辽将士李应元、李九成等抵达吴桥,屯兵新城乡绅王象春庄。孔有德部下士兵因为一只鸡而与王象春子(或奴子)发生冲突,被孔有德"捆打贯耳";士兵焚庄哗变。此前,李九成为孙元化买马,"马价荡尽",至吴桥与孔有德相遇。二十八日,李九成遂与李应元缚孔有德于演武场,首倡反谋,孔有德从之[②]。

二十八日兵变之后,孔有德等叛军"回戈东指",山东诸县纷纷陷落。二十九日破陵县,十二月初一日破临邑,初三日破商河,初四日破齐东,初五日围德平,初六日破青城。此时,山东巡抚余大成发兵剿灭,大败于阮城。孙元化移檄招安,"兼檄郡县不许截杀"。孔有德佯应之。孙元化因致书余大成:"抚局已就,我兵不得往东一步,以致坏事。"于是,余大成、孙元化引兵而退。十二月二十三日,孔有德攻登州,被火炮所阻,遂掠临邑。孙元化与耿仲明定计招抚[③]。

崇祯五年(1632)正月初三日,因守城张焘部下耿仲明、陈光福等辽兵举火内应[④],叛军破登州,总兵张可大自缢死,孙元化引刀自刎不死,与宋光兰、王徵等被叛军俘获。余大成闻登州失守,束手无措,"唯闭户诵经"。十二日,孔有德遣人送孙元化书信于余大成,请求招安[⑤]。巡按王道纯抗言不可接受招安。此日,余大成请徐从治援助的书信抵达武定。

十三日,叛军破黄县,知县吴世扬、县丞张国辅、参将张奇功死之,余大成被革职。此前,熊明遇代梁廷栋为兵部尚书。十七日,朝廷以徐从治为山东巡抚,谢琏为登莱巡抚。二月初一日,徐从治、谢琏俱于莱州就职。初三日,叛军至莱州。孙元化、宋光兰等被孔有德放还,从海上至天津。天津巡抚奏闻崇祯帝,俱被逮下狱。

三月十八日,督理、兵部侍郎刘宇烈,总兵邓玘兵俱至青州。四月初八日,刘泽清兵败于神山下,复引还。四月十六日,巡抚徐从治中弹死[⑥]。五月初八日,朝廷以天津兵备道朱大典为山东巡抚,驻青州。六月初九日,崇祯皇帝决定派关宁兵援助莱州,以高起潜为监军,以总兵金国奇,副将靳国臣、刘邦域,参将祖大弼、祖宽、张韬,游击柏永馥,原任总兵吴襄等统关宁兵四千余人援莱。

六月二十七日,叛军请求议和。二十九日,屈宜扬送求抚禀于谢琏。七月初二日,孔有德接到刘宇烈抚书,遂禁止开炮,并将一开炮士兵"割耳游营"[⑦]。七月初六日,谢琏、朱万年出城招抚。初七日,叛军诱杀朱万年,执谢琏、徐得时、翟昇以去。招抚失败。七月初九日,朱大典任山东巡抚,曾弹劾过孙元化部下张可大的谢三宾代王道纯任巡按。八月十九日,明军在沙河大败叛军,莱州围解。

---

①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23《本纪第二十三·庄烈帝一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208-209页。

②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民国十七年(1928)东方学会排印本,第1b页。

③谈迁:《国榷》(卷91),北京:中华书局,1958年版,第5580页。

④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81页;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(卷114)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(第339册),中国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年版,第652-653页。耿仲明等人为何举火内应?一方面是其与孔有德相识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登州本地人与辽人之间存在着矛盾,而因兵变,登州本地人猜疑城内辽人,并要杀死他们,正如王徵所谓:"登城激杀辽人于内,内变忽作。"参见王徵:《恳祈炤察登州兵变前后事情揭帖》,《王徵全集》,西安:陕西出版集团、三秦出版社,2011年版,第100页。

⑤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6b页。

⑥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31b页。

⑦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52a页。

二十日,李九成于登州诛杀谢琏、徐得时、翟昇。九月初一日,明军围登州。十一月初三日,李九成阵亡。崇祯六年(1633)四月十七日,孔有德、耿仲明由盖州降清[①]。吴桥兵变结束。从崇祯四年(1631)闰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崇祯六年(1633)四月十七日,吴桥兵变历经近一年半的时间,莱州则被围六个月。整个兵变过程中,自始至终,主抚与主剿两派意见不统一。

吴桥兵变中有三个细节值得关注。首先,崇祯五年(1632)二月初三日,孔有德围莱州之原因。据归庄记载,登州陷落后,孔有德感念孙元化之恩[②],愿意接受招安,并求山东巡抚余大成代为申雪。余大成遣使招抚,而朝廷亦有招抚之旨,但皆为巡按王道纯所遏。王道纯藏匿招书不报,并派兵攻击叛兵,遂致孔有德复叛。而此时,孙元化已被放归。此种说法,显然是将孔有德围莱州的原因归结于王道纯。但据《崇祯长编》,登州被攻破后,孔有德将孙元化、王徵、张焘、宋光兰等"幽系一室",并"遗书东抚",即写信给余大成,"令具疏招安"。但书信内容是:意欲朝廷畀以登州八县,方可释甲投顺。参将佘五化(或谓余五化)又在余大成面前极力促成此事。因此,余大成"遂为驰疏请抚"。《崇祯长编》认为,此是孔有德拖延时间,并无就抚之意;之所以放归孙元化,也是用了耿仲明之计而已。据《平叛记》,孔有德让余大成请抚时,王道纯抗言不可。时在正月十二日。十三日,孔有德破黄县。二月初一日,主剿派核心人物徐从治抵达莱州。二月初三日,孔有德将孙元化等人放归。此日,叛兵至莱州。据此可知,孔有德围莱州并非因为王道纯。如果孔有德有意请抚,在放归孙元化之后就不应该围莱州。

其次,八月十九日,莱州之围解。二十日,诸将入城,搜获伪邸报无数。其中有一报云:"……为辽贼猖狂日甚等事奉旨,辽贼惨恶百端,扑灭无效,览奏食不下咽,着兵部马上传与督理宇烈,上紧整兵杀戮,将辽贼尽数擒斩,男妇不容留一人。"[③]此内容不载《崇祯长编》。《平叛记》认为此是伪造,盖恐众心离散,故造此以固之。对于吴桥兵变,崇祯帝的态度较为和缓。兵变发生后,孙元化即被弹劾,但崇祯帝置之不理,让孙元化戴罪立功。登州失守后,孙元化被削籍听勘,余大成仍料理候代。对于被弹劾的熊明遇、刘宇烈等人,崇祯帝亦多庇护。二月初八日,孙元化等抵达天津,崇祯帝才下旨将其下狱。七月初七日,朱万年死难、谢琏等被执后,朝野震惊,招抚彻底失败,崇祯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。二十三日,下令处决孙元化、张焘,将宋光兰、王徵充军,熊明遇解任听勘、令锦衣卫捉拿刘宇烈。崇祯帝在吴桥兵变过程的态度并不坚决,虽然一开始有奏疏请求剿灭,但是可能受兵部决策的影响,崇祯帝一开始并没有下定决心剿灭。此也是吴桥兵变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才得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。

再次,崇祯五年(1632)七月初七日,孔有德接受刘宇烈招书,让朱万年、谢琏入营,进而诱杀朱万年。此是吴桥兵变后最为关键的事变,导致主抚政策彻底失败,以及孙元化被诛杀。七月初一日,刘宇烈让程嘉训入莱谈抚事。初二日,屈宜扬与孔有德谈招抚,孔有德答应招抚。初六日,孔有德遣屈宜扬告之朱万年等人:"业已受抚,请防院内监各官出城开读诏书,即当解围受抚。"初七日,谢琏、朱万年出城,"诱至驿下","贼以咳嗽为号,齐涌而至,琏等遂悉为所掳"[④]。孔有德攻城,"为炮所拒",乃迫朱万年呼降。但朱万年"骂贼不绝口,遂遇害"[⑤]。据《平叛记》,初三日,孔有德要求刘宇烈去新河亲自招抚,但屈宜扬虑其不测,在禀揭中作暗语,刘宇烈遂不往。换言之,对于此次招抚,刘

①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68a页;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608页。

②此据《清史稿》:"元化自到不殊,有德等以元化故有恩,纵使航海去。"参见赵尔巽等撰:《清史稿》卷234《列传二十一·孔有德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版,第9396页。

③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61b页。

④《清史稿》谓:"有德复伪请降,诱琏出,杀之。"参见赵尔巽等撰:《清史稿》卷234《列传二十一·孔有德》,第9396页。不确。谢琏死在登州,被李九成所杀。

⑤《崇祯长编》(卷61),"史语所"藏钞本,中国台北:"中研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年版,第3477页。

宇烈、屈宜扬等并没有十分确定。而朱万年、谢琏等人因为莱围甚久、内外无援,不得已孤注一掷,只身犯险。又据《平叛记》,初七日朱万年入叛兵营,孔有德留饮甚欢,朱万年深信不疑。朱万年入莱州对谢琏说:"贼抚是真。"谢琏亦信以为真,甚至有人提议备卫以防不测,被谢拒绝[①]。朱万年被执后,曾对孔有德说:"执我无益,可以精骑从我呼守城者出降。"叛兵果以五百拥朱万年至城下。朱万年大呼:"我已被擒,誓必死,彼精骑尽在此,可发炮急击之。毋以我为虑。"杨御蕃尤不忍,朱万年复顿足大呼,叛兵怒杀之,大骂而死[②]。《崇祯长编》与《平叛记》关于朱万年之死略有出入,但可以看出孔有德并非真心接受招抚,足可见叛兵之狡诈如此。

二、兵变过程中的主抚与主剿

晚明兵变并不鲜见,但鲜少如吴桥兵变那样复杂及影响深远。吴桥兵变发生后,主抚与主剿两派意见不统一,导致抚、剿不定,从而延误战机,使得莱州被围长达半年,并导致徐从治、朱万年、谢琏等重臣被叛军所杀。虽然李九成、李应元被诛,但孔有德、耿仲明携带红夷大炮等军火器械投降后金。后来,孔有德、耿仲明等凭借先前孙元化的良好训练,以及先进的火器装备,为大清打下了半壁江山,先后被封为异姓藩王。而随着吴桥兵变中招抚政策的彻底失败,主剿派对主抚派进行反攻倒算。温体仁借机对周延儒等势力进行攻讦,最终取而代之。主要由亲西学士大夫组成的主抚派,随着徐光启的去世,最终退出了晚明的政治舞台。

(一)主抚

吴桥兵变中,主抚的地方大员是孙元化与余大成,朝中主抚派则为兵部尚书熊明遇、侍郎刘宇烈。刘宇烈作为山东督理,直接负责招抚事宜。崇祯五年(1632)二月初一日,刑科给事中吴执御在疏中称,"主东事者摄先人之声,意中求抚更切"[③],指朝中兵部主抚。《崇祯长编》谓:"时兵部先入余大成可抚之说,赞画主事张国臣方以抚行,故道纯之言格而不入。"[④]换言之,兵部之所以主抚,是受余大成意见的影响。

二月二十七日,张国臣派都司金一鲸持书为叛军求抚[⑤]。徐从治认为金一鲸"虚张贼焰,真奸细也"[⑥]。二十八日,金一鲸复至,再次为叛军求抚。徐从治不允,欲斩之[⑦]。此月,王徵上疏解释登变原因,是因为辽东兵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,并指自己被俘后没被加害,反被卫守;又指孙元化至登州时,城已陷等等。王徵上疏似为自己以及孙元化辩解,同时又似为主抚政策背书[⑧]。

三月初七日,张国臣遣人持书为叛军求抚。据谢琏、张国臣上疏谓叛军一闻天子诏,便撤围不攻、止兵攻掠,又云差官宣谕李九成等遂撤兵不攻。谢琏认为此是"张欲愚贼,反为贼愚"。金一鲸以之欺张者,因以之欺兵部。谢琏与徐从治"力排其说","其不坠贼术,而为登续者无几矣"[⑨]。徐

---

①与《平叛记》不同,《黔诗纪略》则谓谢琏误信孔有德,然后将朱万年"强以行",谢琏又拉杨御蕃,被拒。参见冯楠总编:《贵州通志·人物志》(第1册"朱万年"条),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1年版,第54-57页。

②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54a页。

③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58页。

④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73页。

⑤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22a页。

⑥徐从治:《围城日录》,《徐忠烈公集》(卷2),收入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》(第70册),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5年版,第660页。

⑦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22a页。

⑧王徵:《恳祈炤察登州兵变前后事情揭帖》,《王徵全集》,第100页。

⑨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23b页。

从治认为张国臣之疏“不啻说鬼说梦,以欺朝廷,而中贼计,恨不能借尚方剑诛此大奸细也”①。

实际上,主剿派的徐从治亦曾主张招抚,不过是招抚登州的耿仲明,试图离间叛军。三月初七日,徐从治派往登州招抚耿仲明的张有恒返回莱州。张有恒未至登州,因闻毛承禄投敌而回。此月,张国臣上疏为孙元化解围,主要内容有:吴桥激变有因,叛军一路封刀不杀,叛军一闻诏使遂止兵勿攻等语。四月,刘宇烈兵败沙河,被弹劾。兵部尚书熊明遇“计无所出,惟欲招安结局”,因此加辽人陈洪范提督衙,“意在抚也。”天津旧将孙应龙,自谓与耿仲明兄弟善,意欲招抚,最终却被耿仲明擒获斩杀。二十九日,莱州府推官屈宜扬入叛军讲抚。五月初七日,屈宜扬谓叛军请抚,而刘宇烈以屈宜扬之言上闻,兵部、兵科皆信之,谓“贼既愿抚使,可借以息兵。”又谓:“孔有德等悔罪求生,姑从开网。”崇祯帝犹豫不决,下旨:“督抚按各官一面励集援师,亟解莱围,如罪弁果输诚归命,必责令如何自赎,永消疑贰,不负朝廷肆赦矜全之意,毋得苟且游移,但以遥请塞责。”②五月十六日,督师刘宇烈疏请抚贼。《平叛记》谓“时莱围甚急,宇烈不能剿,反为具本题抚”③。

因崇祯帝令关宁兵援莱,叛军“扬言受抚”。六月十三日,推官屈宜扬自请入叛军营。叛军待之以礼。屈宜扬派人告之刘宇烈。兵部等“部科会议,谓贼既愿抚,宜网开一面”。叛军则在莱州城下宣称业已请抚。六月三十日,户部侍郎刘重庆因上疏请师,被降为御史。虽然此时已发关宁兵,但中外仍以抚为主。

七月初一日,督理刘宇烈使都司程嘉训入莱州谈招抚事宜。程嘉训谓奉刘宇烈令,让孔有德择日接旨接受招安。刘宇烈信内云:“抚事已定,烈一身任之。近而一时之唾骂,远而千载之是非,俱非所计。”④初五日,推官屈宜扬入莱城,云叛兵且降,欲一见防院谢琏。初七日,谢琏“坚主款”;初八日,朱万年死,谢琏等被俘,招抚失败⑤。十一日,主抚派核心熊明遇下定决心:“从今再不讲抚矣,亟催进兵矣。”⑥

七月十七日,刘宇烈被逮下狱。二十四日,屈宜扬死于城隍庙。八月初一日,孙元化、张焘伏诛,熊明遇罢官。至此,吴桥兵变中的主抚力量被消灭。但八月初五日,监军高起潜仍复遣都司朱国祚入登州招抚。

周延儒与孙元化同年中举,“最相昵也”⑦。徐光启乃孙元化之师。因此,周延儒、徐光启乃是主抚的最大支持者。《烈皇小识》载:“上海与登抚,师生莫逆,此老迂憨,勇于任事,而不顾利害,日夜为主抚之说,以祈纾登抚之死。”换言之,徐光启推动招抚,主要目的是力保孙元化。孙元化被逮后,周延儒提出“查饷覆审”,无非是为了拖延时间,并授意刘宇烈招抚,希望招抚成功,能保住孙元化性命⑧。“首辅周延儒谋脱其死,不得也;则援其师光启入阁图之,卒不得。”⑨

而巡按王道纯则指孙元化为逆贼;徐从治直指孙元化通贼;陕西道试御史甚至认为孙元化已经为孔有德所“拥戴”。《明史》认为孙元化“抚议之误国也,可胜言哉”!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载乾隆帝谓:“叛卒揭竿倡乱,本易剪除,其得以拒守经年,实由于将兵者之迟疑不进,剿抚成效,即此了

①徐从治:《围城日录》,《徐忠烈公集》(卷2),收入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》(第70册),第663页。

②《崇祯长编》(卷60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429-3430页。

③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40b页。

④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52a页。

⑤《国榷》载为八日,《平叛记》则为七日,参见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93页;毛霦:《平叛记》,第53a页。

⑥《崇祯长编》(卷61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521页。

⑦文秉:《烈皇小识(外一种)》,《明代野史丛书》,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2002年版,第80页。

⑧见孙三杰奏章,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62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544页。

⑨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248《列传第一百三十六·孙元化》,第4301-4302页。

然。彼欲悬心示以招贼者,真不啻如梦呓矣。"[①]俞樾则谓:"登州之陷,咎由元化,安得云死非其罪?"[②]总而言之,孙元化主张招抚,不仅为其带来了杀身之祸,也导致了当时以及死后数不清的骂名。那么,孙元化为什么要力主招抚呢?

孙元化之所以主抚,一方面是认人不清,另一方面是认为辽人可用。另外,晚明对于兵变的一贯政策即以招安为主,即使是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都曾被招安;另外,如郑芝龙亦被招安。其次,兵变之初,兵部等亦主张招安,"朝廷亦以事由激变,罪不在公(孙元化——引专注)。故止处公以降级,责令招抚"[③]。再次,孙元化在登州所训练的新式营制军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。孙元化认为此支队伍可用于对后金的战争,而不应被剿灭。此新式营制军队可谓浸透了徐光启、孙元化、王徵等人的心血。综合权衡利弊得失,招安显然要比剿灭更加符合朝廷的利益。归庄《孙中丞传》:"公初闻变,谓有德尝有平岛之功,又一军精锐,非官兵敌。"[④]可谓道出孙元化力主招抚的主要原因。

(二)主剿

吴桥兵变发生后,山东巡抚余大成一开始主剿,但兵败后消极应对,亦被当作主抚派;巡按王道纯亦主剿,但未及时发兵援救,因此亦被主剿派弹劾。然《明史》谓:"登莱巡抚孙元化遣使招抚。道纯以为非,请敕二抚速剿。及贼陷登州,元化被絷,大成犹主招抚。道纯愤,抗疏力争。"[⑤]因此,《明史》将王道纯视作主剿派成员之一。

崇祯五年(1632)正月二十一日,户部尚书毕自严、工部尚书曹珍、户部右侍郎刘重庆、兵部左侍郎宋盘、左副都御史高弘图上疏,针对孔有德叛乱提出定着、正着、要着,定着即为"天讨难稽,势必剪灭",而正着为"先为胜势以待之,不得轻进以再误",要着为"贼据登窥莱,黄为莱之东蔽,守莱势必守黄"[⑥]。此疏主旨即为剿灭。同年二月,叛军围莱州后,即有御史上疏请师。二月十五日,四川道御史王万象上疏崇祯帝,请求主客军兵星夜进剿,趁贼势未炽,可一鼓而就擒也[⑦]。

二月初三日,王道纯上疏反对招抚,指叛军"以求抚愚我,一抚而大城陷,再抚而登郡失,三抚而黄县破,四抚而直逼莱州城下,塘报不通,岌岌乎殆矣"。王道纯乞求朝廷"多发兵马,择威望名将摠之而前,乃可挫其锋耳"[⑧]。

二月初七日,山东道试御史金兰上疏反对招抚,提出:"于要害处悉令列营固守,星罗棋布,使进无所掠,退无所归,食尽兵疲,势已成擒,然后以大兵四面临之,有延颈就戮耳。堂堂天朝,计不出此,而必拘拘以抚为事哉?"[⑨]同日,王道纯上疏再次反对张国臣招抚叛军[⑩]。

二月二十四日,谢琏、徐从治会稿请兵部代题请师,其中即提到王道纯没能及时发兵援救,"王道纯沈毅明决……而未见救焚拯溺","按臣不能无解望焉"[⑪]。此时,徐从治有诗曰:"奈何肉食谋,

---

①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81页;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(卷114)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(第339册),第653页,"眉批"。

②俞樾:《荟蕞编》卷3《孙颍庵》,《俞樾全集》(第25册)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7年版,第66页。

③归庄:《孙中丞传》,《江东志》(卷8),《上海乡镇旧志丛书》(第14册),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6年版,第160页。

④归庄:《孙中丞传》,《江东志》(卷8),《上海乡镇旧志丛书》(第14册),第160页。

⑤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264《列传第一百五十二·王道纯》,第4566页。

⑥《崇祯长编》(卷55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27-3228页。

⑦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14b-15a页。

⑧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72页。

⑨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82页。

⑩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82-3283页。

⑪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19b页。

议抚不议击。”体现出其无奈之情[①]。二月二十六日，户部右侍郎刘重庆上疏请师。刘重庆为掖县人，言叛军用火炮攻城，情势危急，请求让保定巡抚丁魁楚、天津巡抚郑宗周、河南巡抚樊尚璟发兵援救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四川道御史王万象上疏请师。王万象为莱州人，接到家书，言叛军“加倍紧急”，于城下安置红夷炮，内容与谢、徐稿类似，可能来自塘报，或受谢、徐之请求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徐从治遣人入京递送塘报，反对张国臣招抚，“国臣以抚为叛兵解嘲，而叛兵即借抚以为缓兵急攻之计”。徐从治反对孙元化所主张的招抚，提出：“臣当死厉鬼以杀贼，断不敢以抚面谩至尊，淆乱国是。”但“疏入，中朝不以为然”[②]。谈迁指出“盖周延儒主之，上心动”[③]。

五月十四日，乡绅原任左副都御史贾毓祥等上疏告急。贾毓祥在疏中指刘宇烈“亦叛也”，又曰孔有德“甘为辽奴”不可抚[④]。五月十六日，户部尚书毕自严、侍郎刘重庆等针对刘宇烈抗疏排抚议。疏中对孙元化大加挞伐。他指出：“叛贼之变，酝酿于逮抚孙元化者非一日，其吴桥倒戈，待时而发耳。”毕自严认为“贼之罪已徹地通天矣，而孙元化乃以甘言啗贼，借名激变，特倡一抚之说”。毕自严还对余大成提出批评，认为余大成“仰其（孙元化——引者注）鼻息”，“一步不前，听孙元化引贼入室，共成其抚之之局。”毕自严还指出孙元化被逮入京后，仍“欲始终用抚之”，其目的是“缓须臾之死”。毕自严于是对“抚”提出严厉批评，“抚之一字中于膏肓，祸我国家，天下尚忍言哉”！毕自严提出：“至于抚之一字，则斩钉截铁，可无复道矣。”[⑤]该疏还提及南京吏部尚书谢陞曾上疏主剿，即“山东士官南京者，合疏攻宇烈，请益兵”[⑥]。此时，宋可久亦上疏主剿，“请缨解莱围，语甚急切”[⑦]。

同日，四川道御史王万象上疏排抚议。王万象疏中对王道纯提出批评，认为“按臣乃坐视而不救”。王万象认为与叛军讲抚，有损国体。此理之不当抚。而叛军自吴桥兵变后烧杀抢掠，此情之必不抚也。王万象认为叛军“明以抚诱我，而暗以兵袭我”，因此，“势不之不能抚者也”。王万象认为主抚者是孙元化，以及左右庇护孙元化者。

六月初五日，户部右侍郎刘重庆上疏请关宁兵援助莱州。刘重庆上疏是因其接到谢琏、朱万年以及乡绅贾毓祥书信。刘重庆认为“不可抚”，要求援助莱州的邓玘、陈洪范、牟文绶等不可退缩。

同日，王万象上疏请关宁兵。王万象在疏中指出“执政者图片时之安而无长虑”，“佐理者徼万一之幸而乏久计万全之策”，是指责熊明遇、刘宇烈主抚政策。王万象请求崇祯皇帝派祖大弼、金国奇、靳国臣、吴襄等刻期进兵。《平叛记》作者毛霦认为刘、王的奏疏最终打动崇祯，使得崇祯下定决心“诛罪抚，撤边防，以解莱围”。

六月二十三日，谢三宾任山东巡按。好友戴澳致信谢三宾以鼓励其不要畏惧；戴澳又致信朱大典，提醒对方除恶务尽，以免给人口实[⑧]。六月三十日被降为御史的刘重庆再次上疏反对招抚，认为

---

①徐从治：《入莱城被围作》，《明诗综》（卷60），《四库提要著录丛书》（集318册）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0年版，第432页。

②毛霦：《平叛记》，罗振玉编：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，第27a页。

③谈迁：《国榷》（卷92），第5588页。

④时人称此疏“一字一血”，在士人中间颇为流传。参见贾毓祥：《公乞急救莱城疏》，《平度县志》（第29编）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》，山东省出版管理处内部资料，1987年，第785-786页。

⑤毛霦：《平叛记》，罗振玉编：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，第41b页。

⑥张廷玉等撰：《明史》卷248《列传第一百三十六·徐从治》，第4300页。

⑦严有禧纂修：乾隆《莱州府志》（卷10）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山东府县志辑》（第44册）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0年版，第220页。

⑧戴澳致谢三宾、朱大典信，戴澳：《杜曲集》（卷6），《明别集丛刊》（第5辑第39册）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16年版，第588-590页。

“病根之根只是抚之一字,为贼所愚,为贼所卖耳”[①]。七月初一日,王道纯再次上疏反对招抚,认为叛军“狡诈百端,抚亦叛,不抚亦叛”,“若非大兵压之以制其死命……又将何以制之”?王道纯认为“御贼无他法,多备兵马”,“庶几一了百了,一定永定”[②]。十三日,“登贼劫抚报至,举朝大骇”,熊明遇“惶惧不知所措”,廷议调关外兵剿灭[③]。十六日,王万象上疏请斩刘宇烈。此疏针对七月初七日朱万年被叛军诱杀一事,请求崇祯皇帝诛杀刘宇烈。同时弹劾张国臣、屈宜扬、邓玘、刘国柱等人。十七日,王道纯回京听勘。八月初五日,巡按谢三宾上疏反对招抚,“请绝口不言抚字”[④]。九月,钱谦益接邸报,知莱围已解,甚喜,撰诗一首,嘲讽主抚派官员,称赞其门生“谢君(谢三宾——引者注)足办贼,谈笑行策勋”[⑤]。

由此可见,吴桥兵变中主剿的核心人物是徐从治。徐从治死后,主剿者为谢琏、朱万年。配合徐从治等人主剿意见的有御史王万象、户部尚书毕自严、户部侍郎刘重庆、南京吏部尚书谢陞、戴澳等人。但谢琏、朱万年配合刘宇烈的招抚计划,曾入叛营招安。《平叛记》载:“谢公素不言抚,至是而亦从之者,直以久困无援,内储告罄,不得已躬试不测,为孤注计耳。”[⑥]总兵杨御蕃则坚决反对招抚。朱万年与谢琏被孔有德俘获后,主剿成为共识。温体仁“特出疏力攻主抚者”[⑦]。主剿与主抚变成了党争攻讦的借口,“彼以抚为败局矣,此方以抚为嚆矢”[⑧]。

徐从治之所以主剿,与其人生经历有关。徐从治曾经在山东镇压过徐鸿儒起义。徐从治对于起义者主张严峻镇压的政策,曾檄各邑“凡获姚贼,审真即斩而后申报”。徐从治认为“治乱国用重典”[⑨]。《明史》则载:“(徐从治)督漕江南,妖贼再起,巡抚王惟俭奏留从治,仍守沂。按臣主抚,从治议不合,遂告归。”又谓徐从治“御贼类主剿不主抚,故往往灭贼”。徐从治任蓟州兵备的时候,亦曾参与镇压士兵哗变事件。徐从治的主张是“功罪不明不足以鼓三军之气,而利弊不悉不能以革沿习之风”[⑩],对于哗变“首恶”者即行正法,并传示各军。因此,徐从治以一种铁腕的方式处理农民起义与兵变,与孙元化颇为不同。

而毕自严主剿,与其家族利益相关,其兄毕自肃死于辽东,毕家与辽东人有着血海深仇。刘重庆、王万象、谢陞、宋可久等均为山东本地人。他们主剿固然有着现实的利益考虑。杨御蕃曾与徐从治一起镇压过徐鸿儒起义;张可大曾参与镇压京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[⑪]。因此,不难理解他们都主剿。谢琏、朱万年受徐从治影响亦力主剿。

三、吴桥兵变中的党争因素

晚明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。党争使得许多官员不能有所作为,“动辄得咎”,还不如

①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51b页。

②《崇祯长编》(卷61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467页。

③《崇祯长编》(卷61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496页。

④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59a页。

⑤钱谦益:《壬申九月得莱城解围报》,严有禧纂修:乾隆《莱州府志》(卷15),第375页。此诗亦载钱谦益:《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版,第490页。

⑥毛霦:《平叛记》,罗振玉编: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第53b页。

⑦文秉:《烈皇小识(外一种)》,《明代野史丛书》,第81页。

⑧语出礼科给事中张国维,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61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531页。

⑨徐从治:《围城日录》,《徐忠烈公集》(卷2),收入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》(第70册),第641页。

⑩徐从治:《围城日录》,《徐忠烈公集》(卷2),收入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》(第70册),第651页。

⑪李远达:《张怡的南京交游考证与〈玉光剑气集〉的编纂》,《燕园史学》(第12辑),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2017年版,第46-57页。

无所作为、阿谀上意。崇祯帝即位以后,虽然对党争深恶痛绝,但其自身多猜忌,“一事诖误亦谴,一言不当辄罪”[①],前后诛杀总督七人,诛杀巡抚十一人,更换内阁大学士则达五十人,而对于后金战争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,剿抚不定,最终导致国势衰败,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正如刘宗周所言:“陛下求治之心,操之太急。酝酿而为功利,功利不已,转为刑名;刑名不已,流为猜忌;猜忌不已,积为壅蔽。”[②]

孙元化升任登莱巡抚时,曾以恢复四卫为己任,向兵部请马价二万两。崇祯帝“喜其实心任事,许以速发”。但时任太仆寺卿的郑宗周则反对。郑宗周质疑孙元化以粮草难应为借口,实则推卸责任。郑宗周后任天津巡抚,正是其本人将孙元化、张焘等人逮捕下狱。值得注意的是郑宗周与徐从治、谢陞同年进士[③]。

崇祯四年(1631)二月,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疏弹劾孙元化,反对孙元化在登州招徕葡兵以及引入西洋大炮。闰十一月初三日,户科给事中吕黄锺上疏弹劾孙承宗、孙元化。吕指责孙元化“碌碌无能,冒兵糜饷。于敌人之西入也,绝不闻牵制之能;于岛帅之见辱也,渺不见弹压之略。则亦木偶人耳”[④]。

同月初六日,江西道试御史刘宗祥上疏弹劾孙元化,认为孙元化“庸劣无能,滥员海侥,种种悖谬,致酿衅端”,并列举孙元化罪状四端。同月十一日,陕西道御史余应桂上疏弹劾周延儒,疏中指周延儒庇护孙元化。此疏中的指控有三:其一,孙元化失职,但被周延儒庇护;其二,孙元化贿赂周延儒;其三,孙元化为了谄媚周延儒,而给周文郁冒功[⑤]。

十七日,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上疏弹劾周延儒,提及余应桂疏中所谓的孙元化“貂参金珠”贿赂周延儒之事。同日,四川道试御史路振飞上疏弹劾周延儒“不能进贤退不肖”,“徒知营私植党、婪贿肥家,欺君误国”。二十日,吏科给事中熊开元上疏,其中有言:“丧地之王化贞、冒饷之孙元化、辱国之孙承宗或偷生不死,或慰藉有加。”旁涉周延儒。二十四日,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,“欺贪无忌”“诡辩不已”。余应桂谓其前疏指周延儒庇护孙元化以及受贿之事确凿无疑,“明明自认”。余应桂请求崇祯帝对周延儒予以“重处”[⑥]。

由此可见,在崇祯四年(1631)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吴桥兵变之前,弹劾周延儒、孙元化的奏章业已很多。这些弹劾孙元化的奏章,虽然表面上是指责孙元化失职、冒饷等,实则剑指孙元化背后的保护者周延儒。崇祯初年的阁讼案后温体仁、周延儒入阁,但温体仁必须清除周延儒才能当上首辅。因此,此时攻击周延儒的奏疏背后可以隐约看到温体仁的身影。

吴桥兵变发生与结束后,弹劾孙元化以及受其牵连的周延儒、熊明遇、刘宇烈、余大成等奏疏纷至沓来。温体仁更可借此良机排挤周延儒。

十二月十四日,广东道试御史宋贤上疏弹劾余大成、孙元化,指责孙元化“侵饷纵兵,贪秽已极,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,则剿截主将,再逞于济南,则攻陷城池,皆法之所不赦者”。宋贤请求崇祯帝对二人“亟行褫革,别选贤才”,“立赐斥谴,以昭国宪”[⑦]。

十二月十六日,户科给事中吕黄锺再次上疏弹劾孙元化,指斥孙元化“养虎贻患”,反对让孙元化戴罪自赎,认为孙元化“剿御无闻,悠忽玩视”,“诞妄设辞,欺君误国,法不容贷”,应该“重惩以杜效尤”[⑧]。

---

①《崇祯长编》(卷62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536页。

②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255《列传第一百四十三·刘宗周》,第4397页。

③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(下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3年版,第2586页。

④《崇祯长编》(卷53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078-3079页。

⑤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53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082-3083、3091-3092页。

⑥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53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104、3111、3121-3122页。

⑦《崇祯长编》(卷54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166页。

⑧《崇祯长编》(卷54),“史语所”藏钞本,第3170页。

十七日,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上疏弹劾孙元化,指斥孙元化"威令不行,节制无法"。又谓孙元化"坐拥节钺,身负数罪,顾悠悠忽忽,安危利灾,国事其何赖焉"?萧奕辅请求崇祯帝"立正其失律欺罔之罪,庶军政肃而人心知警"。同时,山东巡按王道纯上疏请求崇祯帝敕谕余大成、孙元化镇压叛军,"极力收拾,灭此朝食"①。

二十一日,兵科给事中汪始亨上疏弹劾孙元化、余大成,指二人"悠悠玩视,略无剿御之术","秉节钺者一以恣其蹂躏,一以养成因循,临时又故作镇静,勿为张皇之说以盖之,恐弥天祸成",请求崇祯帝下令"刻日殄除,庶海岱之民脱此水火"②。

崇祯五年(1632)正月十四日,贵州道试御史丘民仰上疏弹劾孙元化、余大成,指二人"认贼作子,坐听其劫库杀官,连破数城,如摧枯折腐之易"。又谓:"元化孑身而奔,损威辱国,乃匿不以闻,如其自惭狼狈而不敢报,罪已莫赎,倘有意蒙蔽,其罪尚容诛乎?"丘民仰指余大成佞佛,修斋念佛,不禁叛乱而禁杀生,迟迟不肯发兵,而"叛兵敢于狰狞,明知大成非杀贼之人耳"。丘民仰请求崇祯帝"速斥二臣,另选贤能,庶可补救于万一"③。

此时,徐从治胞弟徐昌治为解莱围,曾撰有揭帖,在朝野中散播,以求援助。张自烈看到揭帖后撰有《代科臣劾奸辅疏》④,攻击周延儒,指周延儒用孙元化是用人之私;又撰有《东事议》,攻击孙元化、余大成,指责二人"骫法玩寇,坚持抚局,一抚而黄县失,再抚而登州失"。又攻击刘宇烈,"三尺童子知其不可,刘宇烈仍以抚自愚"。张自烈借此批评首辅,"深恨阁臣之谋国误也","周延儒辅政以来,建奢勿靖……延儒独宴然不画一策,即登莱近事,信一私昵之孙元化,以抚自愚。东事既误于始,复用一庸懦之刘宇烈"⑤。张自烈久考不售,对于孙元化由举人超擢为巡抚颇为不满。

十五日,户科给事中朱国栋上疏弹劾孙元化、余大成,指二人"悠悠坐视,仅知两相诿卸",请求崇祯帝"敕其同心协剿以绝祸根,并刻期奏效,不得少有观望,不则即以三尺从事,或可少励其万一耳"。十八日,王道纯上疏称孙元化为"逆贼",为孔有德"明通线索"。又称孙元化"僭逆修船取饷,分兵四出,倘再迟十日,山东非复皇上有矣"。二十日,山东道试御史党崇雅上疏弹劾孙元化。疏中指出:"东省之叛兵,荡平犹易,何余大成、孙元化干济无术,败坏至此?"党崇雅请求崇祯帝"霈发见饷,鼓励三军,速殄荼毒"。二十二日,四川道试御史吴彦芳上疏,认为"登兵之变,实旧抚之罪,革之允宜"⑥。

崇祯五年(1632)二月初一日,刑科给事中吴执御上疏,主张对东变主剿,不可主抚。同时,吴执御亦对孙元化进行弹劾,指其为"奸抚"。二月初三日,王道纯据登州生员吴化鹏、吴化鸿具揭,上疏言孙元化"显与贼通,同谋不轨","敢负圣明如此?真罪不容诛矣"。此时,李春旺、刘宗祥等上疏弹劾周延儒,"臣谓督臣可去也,阁臣亦胡可留也"⑦?

二月初四日,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上疏弹劾周延儒及孙元化。吴桥兵变之前,余应桂就已弹劾二人。兵变发生后,余应桂谓:"今观元化所为竟何如?七邑屠矣,登州陷矣,黄县又见告矣。为文为献,化作青磷,小东大东,鞠为茂草。举国家岁费九十九万之民膏悉以付之逝波,谁实致之?"余应桂对此添油加醋,认为孙元化已经为孔有德"拥戴"⑧。余应桂认为孙元化之所以能够逃脱弹劾,就是

①《崇祯长编》(卷54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171页。

②《崇祯长编》(卷54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175-3176页。

③《崇祯长编》(卷55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06页。

④张自烈:《代科臣劾奸辅疏》,《芑山集》(卷1)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(集部第166册),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7年版,第42页;张自烈:《东事议》,《芑山集》(卷2),第51页;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94页。

⑤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94-5595页;张自烈:《东事议》,《芑山集》(卷2),第51-52页。

⑥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55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09、3218、3220、3231页。

⑦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62、3268、3270页。

⑧叛军曾欲拥戴孙元化,但为其所拒绝。参见黄一农:《吴桥兵变: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》,(台湾)《清华学报》,2012年第1期。

因为周延儒之庇护。余应桂将矛头直指周延儒,认为周延儒、孙元化应为兵变承担责任。但崇祯帝认为余应桂"恣意诋诬,亵语混渎",降余应桂三级视事,寻以疾归。

二月初六日,兵科给事中李梦辰疏劾孙元化"偾事偷生,死有余责,迹其往来贼中,身为戎首,无异袁崇焕所为"[①]。五月初四日,福建道试御史祁彪佳上疏,要求严惩吴桥兵变失职官员,对于殉难者则应予以抚恤[②]。

七月二十二日,四川道御史李一鹏上疏,弹劾刘宇烈,"极言督臣刘宇烈庸缩怠弛,万不能办贼,请行罢斥。"七月二十三日,吴桥兵变主要失职官员受到处置,受此牵连的熊明遇解任听勘,刘宇烈以违旨抚逆,"命缇骑拿解来京究问"。此时,吕黄锺、宋权等上疏要求诛杀熊明遇。尽管孙元化已被正法,但弹劾的奏章依然不断,而且牵涉面逐渐扩大。广西道试御史赵继鼎上疏,弹劾刘宇烈、屈宜扬、熊明遇、孙元化、余大成。对兵变中主抚派进行全力攻击,而且言辞激烈,有言"臣恨不能请上方,以手刃诸奸矣"!七月二十七日,熊明遇即被解任,由杨一鹏署理兵部[③]。

七月二十八日,兵科都给事中汪始亨上疏弹劾刘宇烈,指责刘宇烈用屈宜扬招抚,是"犹委罪防抚以希自免"[④]。八月初一日,原任兵科给事中孙三杰上疏弹劾周延儒。与余应桂不同,孙三杰是在吴桥兵变之后,而且是主要责任官员受到相应惩处后,将矛头直接指向周延儒。孙三杰直接提出:"皇上以款抚两事误国,将任事者或诛或逮,已洗千古耻辱,已快通国人心。然庇奸酿祸之根则在首辅周延儒也。"孙三杰怀疑刘宇烈是否是周延儒"私人",而刘宇烈之"抗旨抚叛",是否"延儒与熊明遇指授"?孙三杰提议"立除误国大奸"。孙三杰的奏疏用意很明显,试图将周延儒与熊明遇、刘宇烈的"主抚"联系起来,从而追击周延儒。

八月初三日,孙三杰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。孙三杰认为"养叛陷城通款"均是周延儒所为,孙元化、丘禾嘉均是周延儒之"私人"。孙元化开府登州,"结孔有德为心腹,纵辽兵肆劫,通国知其酿祸,延儒与熊明遇极力庇之"。"元化开门揖盗","百万生灵,化为磷火","延儒恬不动念也"。孙元化被逮入京后,"实恃延儒在内,自分可以不死,乃束身归命,以为抚局张本"。而周延儒"果百计俄延,查饷覆审,无非为孙、余幸抚局之成,可开一线生路,串谋熊明遇,用一张国臣以明掣讨贼之肘,复遣一刘宇烈以硬主抚叛之谋"。孙三杰还谓周延儒明告崇祯帝"宜用剿",但秘授刘宇烈"必主抚"。孙三杰强烈建议崇祯帝"锄巨奸以清揆路"[⑤]。

八月初四日,山东道御史刘令誉上疏弹劾闵洪学。此前,刘令誉业已弹劾闵洪学。而此疏则利用熊明遇因登变等事,追责闵洪学。刘令誉认为闵洪学"私用熊明遇",而熊明遇无论是大凌河之役,还是登州之变、莱州之围等都严重失职,因此,刘令誉认为"今日破坏封疆,实洪学破坏之也。绳以连坐之法,洪学何辞"[⑥]?此是吴桥兵变后,弹劾面扩大化的另一表现。闵被弹劾后,引疾归。闵与温体仁关系善,此或可视作周延儒的反击。

八月二十一日,山东道试御史禹好善上疏弹劾刘宇烈、熊明遇,指出"孔贼之叛,中外皆云宜剿,而刘宇烈独云宜抚",其目的是为了孙元化,因为"抚则孙元化不死,剿则孙元化不生",而置数千兵命、莱城之围于不顾。而"明遇擅和辱国,罪在不赦","明遇宜束身待命以缓须臾之死,奈何竟辞朝而去,将听彼处抚按之勘乎"?因此,禹好善请求崇祯帝"大奋乾断,将宇烈立正军法,明遇追提勘问"[⑦]。禹好善与温体仁善,《明史》谓"好善,体仁客也"[⑧]。

---

①《崇祯长编》(卷5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280-3281页。

②《崇祯长编》(卷59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395-3396页。

③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61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512、3514、3516-3517、3520、3529页。

④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94页。

⑤《崇祯长编》(卷62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546页。

⑥《崇祯长编》(卷62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548页。

⑦《崇祯长编》(卷62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602页。

⑧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266《列传第一百五十四·成德》,第4593页。

二十二日,广西道御史郭必昌上疏。疏内提及孙元化、刘宇烈、熊明遇,有谓"独职掌偶误之臣,犹与封疆坏事之臣并费谳鞫",暗指首辅周延儒。九月十四日,孙三杰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。此时,莱州之围已解。但孙三杰认为,"抚今追昔,奸辅周延儒主抚之罪,真不容诛矣。"刘宇烈曾针对汪始亨的弹劾进行辩解,称阁臣令其"便宜相机"处事。孙三杰则据此认为刘宇烈此意是指周延儒、熊明遇主抚,"三臣当日密商主意,宇烈已和盘托出"。"宇烈惟坚奉延儒之言,全不以剿为事。"同日,云南道御史赵振业弹劾刘宇烈、张国臣。疏内提及张国臣曾具揭反驳,谓莱州固守至今,皆其借抚缓敌所致。赵则认为张国臣"通贼""贪功"。南京山东道御史尹明翼将刘宇烈、熊明遇失职归结于周延儒"庇护所致",请求"暴其罪状以肃宪典"。九月二十五日,湖广道御史王与胤上疏弹劾刘宇烈,请恤徐从治等人。二十七日,孙三杰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,强调:"孔有德之乱,皆延儒私孙元化等以酿成之。"①

十月初三日,王道纯上疏驳斥刘宇烈所奏十余款。二十六日,王道纯再疏劾熊明遇"通贼作奸,故陷封疆十罪",并涉及张国臣、屈宜扬、余五化等人②。十一月初一日,王道纯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、熊明遇、张国臣。据王道纯此疏可知,王道纯上疏弹劾熊明遇十罪后,张国臣亦上疏弹劾王道纯十罪。王道纯认为此是周延儒指使张国臣所为。③十二月初七日,王象云上疏弹劾周延儒,指其"擅政独专"④。

至此,孙三杰、余应桂、卫景瑗、路振飞、吴执御、王道纯、王象云等先后弹劾周延儒。"(周延儒——引者注)所用巡抚孙元化复陷登州,于是言路交章劾延儒。"⑤崇祯六年(1633)正月,宣府太监王坤受温体仁指使弹劾周延儒。给事中傅朝佑、王志道则指责太监不当劾首揆。崇祯帝大怒,将王志道削籍,周延儒不能救。三月初八日,戴澳因卷入剿抚之争,被降调。戴澳认为此是周延儒因掩主抚败局而泄私愤⑥。六月,周延儒引疾乞归,温体仁遂为首辅⑦。

由此可见,吴桥兵变进一步加剧了党争,并加速了周延儒势力的倒台,而让温体仁如愿成为首辅。吴桥兵变中所形成的主抚、主剿两派势同水火。崇祯五年(1632)七月初七日事变后,主剿派占据上风,由于周延儒得到崇祯帝信任,主抚派势力仍然强大。事变结束后,主剿派被温体仁利用,借机对主抚派以及周延儒展开攻击,最终将主抚派一网打尽,并祸及周延儒。主剿派以及温体仁的攻击,是导致孙元化、张焘被诛的重要原因,"台省复交章搆之","温体仁当国,连进密揭,遂当公辟"⑧。

四、结 语

关于兵变发生后的党争情况,《烈皇小识》有如下描述:"登城之变……言路欲借以倾宜兴(周延儒——引者注)……而旧岁枚卜事,一推再推,未奉谕旨。于是宜兴、乌程各欲树其同志,以为薪传之计……上海与登抚,师生莫逆……故宜兴欲借之自助,且卸前担……于是复主剿,乌程特出疏力攻主抚者……登抚之变,乌程显出疏攻主抚者,以阴倾宜兴,宜兴危甚。"⑨吴桥兵变过程中以及

①参见《崇祯长编》(卷63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648-3650、3674-3677页。

②《崇祯长编》(卷64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748-3752页。

③《崇祯长编》(卷65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755页。

④《崇祯长编》(卷66),"史语所"藏钞本,第3814页。

⑤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581页;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(卷114)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(第339册),第657页。

⑥戴澳:《癸酉南还记》,《杜曲集》(卷8),收入《明别集丛刊》(第5辑第39册),合肥:黄山书社,2016年版,第310页。

⑦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308《列传第一百九十六·周延儒》,第5308页。

⑧归庄:《孙中丞传》,《江东志》(卷8),《上海乡镇旧志丛书》(第14册),第160页。

⑨文秉:《烈皇小识(外一种)》,《明代野史丛书》,第80页。

结束后,温体仁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。周延儒之所以让徐光启入阁,也是因为其想为自己脱责;而温体仁则以周延儒、熊明遇、刘宇烈等人"主抚"作为突破口,集中攻击刘宇烈"抗旨抚叛",直接将矛头指向熊明遇以及周延儒。

吴桥兵变发生后,朝中因为主抚、主剿形成了两派,原因及目的各有不同。兵变快要结束时,主抚派彻底失败,主剿派即对主抚派反攻倒算。兵变结束后,主抚派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,而主剿派官员则受到褒奖。主抚与主剿之争就成了党争的工具,温体仁借此打击周延儒及其他反对自己的势力成功上位。党争使得兵变决策过程变得异常复杂,而兵变后的追责变成了党争借口,则进一步加剧了党争。

除了上述所谓的主抚、主剿两派的激烈党争之外,我们还可以看到同年关系在党争中的影响。兵变过程中的主剿派以及弹劾主抚派的人主要来自天启二年(1622)与天启五年(1625)进士。同年之谊,使得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能够保持一致,并互相支持。例如,因查饷失职,崇祯帝下毕自严狱,给事中吴甘来抗疏论救,而吕黄锺、卢兆龙、郭必昌、蒋德瑗等亦曾参与其中[①]。另外,祁彪佳、华允诚曾上疏要求严惩兵变中的失职官员,但对孙元化、王徵似颇多同情。二人与王徵有同年之谊,祁彪佳亦曾提及华允诚曾上疏营救王徵[②]。

党争使得吴桥兵变逐渐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,此外还导致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。首先,招抚、媾和等变成了"政治不正确",凡提出"招抚"者极易被弹劾,甚至有人提出:"此后兴师用兵,敢言抚字者立斩军前,以示不赦。"后来陈新甲因为泄露与后金讲和之事,引起朝野震惊,崇祯帝无奈只好下令处死他[③]。其次,吴桥兵变使得亲西学派在政治上被一扫而空,对晚明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吴桥兵变过程中的主抚派与主剿派分属于亲西学派与反西学派。主抚派旗手熊明遇对西学非常熟悉,著有《格致草》等西学著作。熊明遇曾积极推动引入西洋火炮、派人赴澳门募兵。主抚派刘宇烈、刘宇亮兄弟为四川绵竹人,后为传教士利类思(Louis Buglio,1606—1682)进入四川传教提供了支持。正是得到刘氏的支持,"弃邪归正者甚多,领圣洗者亦复不少"[④]。徐光启、孙元化、王徵为天主教徒,也是西学的推广者。张焘是天主教徒李之藻的门生,曾与孙学诗一起赴澳门募兵和购铳。在孙元化麾下的还有其子和鼎、和斗、和京,以及孙元化外孙沈卜琦,及和鼎的表姐夫潘云柱、潘氏内弟沈履素等等,他们均属于亲西学派[⑤]。此外,主抚派成员之一宋光兰,由山东巡按高捷举荐。高捷曾从利玛窦受日晷及星历图,并延致庞迪我入钦天监[⑥]。随着崇祯六年(1633)亲西学派殿军人物徐光启的去世,通过西学救国救民的愿望也付之东流。而徐光启所留下的遗产即火炮与历法,以及孙元化所训练的将领等反而为大清所用[⑦],"前登州火器大炮,与精其技者皆归于建州矣"[⑧]。正如饶宗颐所谓:"明廷非不谙科学武器之重要与战术之革新,奈僨于人事,既得利器而人谋不臧,反以资敌。"[⑨]

[责任编辑:马晓雪]

①参见谢国桢: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版,第151页。

②宋伯胤编著:《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》(增订本),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版,第74页。

③张廷玉等撰:《明史》卷257《列传第一百四十五·陈新甲》,第4439-4440页。

④韦羽:《18世纪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》,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4年版,第17页。

⑤孙和鼎:《都阃潘于王暨元继配两沈硕人合葬墓碣铭》,《江东志》(卷10),收入《上海乡镇旧志丛书》(第14册),第251页。

⑥参见黄一农:《两头蛇: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版,第242页。

⑦诸多亲西学派人物(包括天主教徒)在鼎革后投降清朝,并帮助清朝奠定统一基业。参见黄一农:《吴桥兵变: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》,(台湾)《清华学报》,2012年第1期。

⑧谈迁:《国榷》(卷92),第5608页。

⑨饶宗颐:《序》,马楚坚:《明清人物史论析》,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1996年版,第1页。